

前 言

《朝阳文史资料》首辑与读者见面了，这是我区政协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积极联系社会各阶层人士，进一步促进爱国统一战线发展，推进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可喜结晶。

在征集文史资料的过程中，区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人士热情支持，有的作者一次交来三个资料稿，有的作者根据编辑要求三换其稿，有的年迈不能写，便不厌其烦地口述，对这些关怀和支持，我们在这里表示由衷的谢意。

《朝阳文史资料》为不定期刊物，它以作者亲闻、亲历、亲见为原则，以“存真，实事求是”为基础，并注意选取反映本区历史具有地方特色的稿件。

由于时间和水平所限，我们编印的《朝阳文史资料》首辑一定存在很多不足，热诚希望各位读者多多批评指教，同时也希望多多提供文史资料或提供了解这方面情况人士的线索，为把本刊办好，不负厚望，诚愿作者、读者、编者携手共进。

目 录

伪满覆灭前夕.....	刘佐卿（1）
我所知道的长春情报站及其结局.....	李 言（4）
我在两次运动会上所见到的张学良将军.....	王国琪（6）
朝阳区最早的园林.....	李香泮（11）
回忆常恩多将军.....	张树德（12）

伪满覆灭前夕

刘佐卿

一九四五年四月，我从佳木斯市调到伪国务院总务厅工作。到了长春，看到所有的百货商店的货架上的铜和铁都被拆光了，连人行道边的铁柱和铁锁链，甚至贸易批发中心（泰发合）的铁栅门窗和拉手也都给拆掉了，这使我预感到日寇已到了山穷水尽，濒于灭亡的前夕。

八月九日晚，电灯初上，突然空袭警笛响起来，起初以为是在演习，可是不一会儿，就听到轰轰的爆炸声。居住在楼下的日本人安田一面狂喊：“空袭啦！”一面用砖头砸没有熄灯的人家的门窗。紧接着，义勇奉公队（居民奉命组成的防空自卫组织）到指定地点集合，轮流值班，折腾了一夜。

第二天上班听说昨夜是苏联红军飞机在东大桥监狱附近投了几枚炸弹，有的还落在桥旁小学院内，但没伤人。同时，日文报纸也报道了苏联红军从诺门汗、黑河、外蒙边界一带分几路攻入的消息。

当时在伪总务厅内传说四起，有的说，溥仪和伪国务院要一起撤到通化；有的说撤退时，中国人的高等官员都得跟去；也有的说，中国职员在撤退前要在儿玉公园（今胜利公园）内用机枪点名，闹得人心慌慌。

八月十二日上班以后，看到小轿车排满总务厅的前庭。大家揣测可能是各部次长在开会，研究重大决策，估计形势要发生重大变化。事后听说，在这个会上决定：一、伪政府马上撤往通化；二、

对所有伪职员都发给相当两年工资的遣散费。我怕跟着上通化，索性第二天就不上班了，并委托同楼会计科的老蔡替我代领遣散费。

八月十四日老蔡替我领了遣散费，并告诉我说晚上召集总务厅全体职员开大会，问我去不去？我说不去，你去听听回来告诉我就行了。当晚九时左右，老蔡开完会回来，告诉我，伪总务长官武部在会上沉痛地说，他和蒋介石已用无线电取得了联系，蒋介石回电要求“坚守岗位，等待接收。”并说政府决定撤往通化，望留下的诸君好自为之，还说明天午间将有重要消息发表。我听了以后，全明白了，高兴得哭了。

八月十五日上午，我知道伪政府已撤往通化，便怀着兴奋和好奇的心情到伪总务厅，想去看一看什么结局。刚一进伪总务厅的大院就看见同科的全井属官一边抹眼泪，一边烧文件，他向我无言的点了点头。我问他楼上还有人吗？他说人事处的职员都在人事处长室，昨夜一宿未归，你去看看吧。我到了人事处刚一开处长室的门就吓了一跳，室内桌椅零乱，日本职员喝得酩酊大醉，有的坐在沙发上暗暗饮泣，有的东倒西歪，胡言乱语。同科的寺岛事务官看见我开门，招手叫我坐到他身边，他说“老刘，一切都完了，今天午间要广播投降诏书，今后的满洲是你们自己的了，你要好自为之。”还说，“今生能否再见面，不一定了。”我看桌上摆着六、七把准备剖腹的短刀，一想一旦广播投降，这些人要疯狂起来别连我也捎上，是非之地，不宜久留，于是借上厕所的机会，我溜出了总务厅。事实上，这些人在广播以后一个剖腹的也没有。有一次在上高市场（日本人向苏军卖旧物的地方）又都见面了。我说看“八、一五”那天的情景，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他们无言以对，啼笑皆非。这就是所谓的“日本武士道精神”和他们自夸的“大和魂”。

八月十五日午间，首先广播了溥仪的退位诏书，接着又播送了日本天皇裕仁亲口读的投降诏书，没等广播完，我住的那个楼的居民就沸腾起来，有的欢呼拥抱，有的高兴落泪，十四年的亡国奴生活终于宣告结束了。

我所知道的长春情报站 及其结局

李 言

国民党国防部二厅长春情报站（代号一〇五站）是在原国防部二厅特别派遣组二九三组的基础上改偏扩建的，是直属国防部二厅领导的派出机构，是半公开性质的特务机关。

它对外的名称是国防部东北联络参谋办事处。地址设在长春市朝阳区建政路建政胡同十号院内。这是一处比较幽静的所在；一栋二层小洋楼，独门独院。表面上看象一家达官显宦的公馆，没有岗哨，大门是紧闭着的，出入时按电铃，来开门的是衣着朴实貌似农村妇女的女佣人。

站长史祚炎是国防部直属少将高参，系吉林省永吉县人，曾毕业于吉林毓文中学。“九、一八”事变前曾在东北军驻洮南屯垦军炮兵司令邹作华部任英文秘书；“九、一八”后曾在国民政府军令部何应钦部下工作，而后转入特工系统，被派到北平从事特工活动，直接由当时国民党军统局北平办事处负责人郑介民领导。

史祚炎是一个长期从事地下活动的老牌特务。由于职业关系，他养成一种沉默寡言，行动严谨，狡黠深谋的作风。

他是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间由北平携家属来到长春，以国防部二厅二九三组少将组长的身份开展工作的。

当时史在长春是客居，他的原定工作地区是松花江以北的大片北满地区，因当时国民党军的统治范围只限于松花江南岸地区，他无法前进只好在长春待命。为了开展工作，史在长春谨慎地有选择地陆续发展了一批骨干分子，绝大部分是同学、乡亲、朋友等亲密关系。组织渐渐扩大起来，人员增加了，于是便把二九三组扩展编成二九一、二九六、二八八和二九三组。各组人选都由史祚炎秘密任命，各组之间横向不发生关系完全是单线领导，各组的办公地址和电台位置均属绝密，只有史一人知道，副官和司机只知道是某某公馆。

我和史祚炎相识于一九四七年三月间，史祚炎委任我为二九三组的上尉组员担任情报编辑工作。因为是在史祚炎的直接领导下，所以有机会接近他周围的亲信和家属，也逐步得到史祚炎的信赖，在一九四八年五月改组成长春情报站时，我被提升为少校参谋，成为站本部的成员，仍担任情报编辑、统计工作。下属各级送来的情报均由史祚炎亲自受理，经他审定认为有用的稍加删改后，交给我编辑定稿，再交秘书审批给译电员译成密码，由史亲自送交电台拍发南京国防部二厅，作为战略资料分呈有关部门审用。

一九四八年春，长春被我民主联军层层包围，国民党军在东北节节失利，吉林市已被我军解放。南京国防部，由于戴笠之死，人员也有变动，军统内部争权夺势日益尖锐。郑介民与毛人凤明争暗斗各自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郑介民被任命为国防部次长仍兼二厅厅长。他为了在东北埋下一个钉子，在东北完全落入共军之手以后留下一批潜伏组织，于是在一九四八年四月间郑介民电召史祚炎去南京汇报工作时，面授机宜，授命史祚炎在长春成立国防部长春情报站（代号一〇五站），命其大力发展组织，加强派遣任务，训练

报务人员，准备潜伏工作，把长春地区定为史祚炎活动的势力范围，但与保密局及其他特务组织绝对不发生横向联系。

这时，我在长春接受了中共地下党的领导，根据地下党的指示，要求我深入敌营，掌握市内各特务组织的活动情况，电台位置，派遣计划，长春情报站的全部情况，尤其要严密监视史祚炎的行动，不使之逃脱，待长春解放时以便一网打尽。

为了掌握敌人内部情况，我在被提升少校之后，便有意去接近史的一些亲信，我利用同他们拜把兄弟的关系经常到他们的宿舍、办公室和史祚炎的办公室去，暗中观察他们的动静，偷看一些机密电稿，获得了很多有利于我们的情报和敌人派赴解放区去的敌特线索，为以后解放长春，搜捕敌特，破获潜伏组织，提供了重要情报。

史祚炎从南京回来后，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分别把在长的各组的负责人以及按排在站本部的骨干分子召到他的办公室传达郑介民的指示和布置站本部今后的工作任务。史祚炎还亲自训练几名密码译电员。

当时长春已是一座孤城，外援全部切断，一切给养全靠空投。长春情报站已停止用现钞发薪，因为纸币太毛了，买一个窝窝头要两亿，一个金戒指只能换二十斤高粱米，每月按人发给口粮，大米三十斤，黄豆二十斤，用以度命。

那些有办法的大小特务，有的贩卖枪支，有的倒卖黄金美钞，大搞投机生意。史祚炎则筹划把老婆孩子以及金条等贵重细软之物运往北平。为了给部下一一种假象，在别人纷纷卖车卖马准备逃之夭夭的时候，史祚炎却花高价买了一台雪佛兰牌轿车，停在门前泰然自若，以示坚持到底的决心。

史祚炎送老婆及孩子去机场时，由他的亲信副官护送，临上飞机，不慎把一只皮箱弄翻在地，金条、首饰、金链等贵重物散落一地，在场的史祚炎非常难堪。因为这暴露了他克扣军饷，领空额以饱私囊的丑行。

史祚炎送走老婆孩子，不免有空虚之感，加上每日战报都是些令人失望的消息，在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时候，便找地方玩扑克去赌钱。他常去宪兵营营长家和警察局督察长家，有时外组来人找史汇报，连他的影子都见不着，楼上他的办公室总是空着，只有老妈子一人在家。

一天，红熙街（今红旗街）卡哨突然来电话，说有一名被派往解放区去的特工人员要进城汇报工作，卡哨要求站本部派人去接，才准放行。经副官用电话向皮祚炎请示后，我与副官一同乘史的轿车到岗哨去。史在电话中指示：“接人时不要叫外人看见，可把来人直接送警察局拘留寄押，不准其回家……”我们到了卡哨，与哨长交涉后把一个被倒绑着的人领出来，我们都不认识他。经问才知道这人是被派到敦化去执行任务的，途经九台时因解放军发现可疑，同行的另一人被扣留，他便趁机逃跑了，然后潜回长春，据说被扣人的包裹里有一台小型发报机。从该人口中，我得知了这一组人的行动计划和报务员的名字，为长春解放后破获潜伏敌特组织提供了线索。

一天，上午十时左右，飞机在宿舍上空投大米，一袋子米正巧落在译电员办公室的屋顶上，把屋顶穿透，米袋子砸在办公桌上，顿时米袋开花，桌上的密码本、电报稿和情报译文等文件也散落一地。我借着去抢救的机会，发现了呈报南京的派遣计划、电文稿等情报。

根据已掌握的情况，我当时判断，长春情报站除在长春设大本营外，往敦化、洮南、海拉尔、哈尔滨、库伦等地都曾派人去过。

史祚炎在一次早会上公布，说他已与长春宪兵营、新七军政治部联系好了，若大规模撤退时，这两个单位向我们提供交通工具；并负责武装保护。这是为了稳定人心，实际上他秘密布置了一套潜伏计划，另组织了一个突围小组，一旦逃跑时，只带一部电台和一个台长、二名亲信副官，台长兼译电员，其他人都不想带走。但后来事实证明他们都没逃出人民的法网。

国民党六十军在长春起义的那天晚上，史祚炎正在胜利公园附近的宪兵营长家赌钱。晚上十时左右得到情报说，六十军要哗变，长春危在旦夕，史慌忙乘车返回，途经胜利公园门口的碉堡时，被六十军起义人员设的哨兵开枪击伤，他掉转车头又逃回宪兵营去，被送到西五马路的施医院抢救。第二天就成为俘虏了。

那天夜晚，史祚炎的办公室内又是一番景象，老妈子、厨师和几名勤杂人员忙着准备撤退时用的伙食，有炒黄豆的，有烙白面饼的，乱作一团；还有几个人在忙着收拾文件、密码和通讯器材。忙到深夜不见史祚炎回来，便各处打电话询问，均说不知。直到天亮也不见史祚炎回来，深知不妙，就在这时，我赶回来了，为了不使敌人产生任何怀疑，我主动推选×××为临时行动小组长，一切听他的调遣。最后决定勤杂人员当即遣散回家，特工人员愿走的可随军撤退，留下的潜伏下来，一面寻找史祚炎的下落，一面静待时机与南京取得联系，以便日后东山再起。

长春解放后，全站二十余名人员无一漏网，都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我在两次运动会上所见到的

张学良将军

王国琪

在东北四省运动会上

一九二八年秋，大约是九月份，记得天气不太冷，东北四省（包括热河省）运动会在沈阳市郊的冯庸大学运动场召开。主办者是冯庸大学，这是一所私立大学。冯庸是军阀冯廷革之子，冯廷革与张作霖关系密切。这次运动会的会长是张学良将军，副会长是冯庸。参加这次运动会的团体，不代表省，是以学校为单位，不分中学大学，一起报名一起开。我当时在吉林省第二师范学校（校址在长春）读书。我们学校大约去了六至七人。我们的领队是校长赵玉勤。队员自带行李，吃住都在冯庸大学。

冯庸大学运动场在该校的楼前，大会主席台就设在学校门前的台阶上。开幕式很简单，没有入场式，只是讲讲话便开始比赛。

张学良将军在开幕式上讲了话。虽然有麦克风，但运动场距离主席台较远，听不太清楚讲话的内容。我是短跑运动员，正忙乎准备比赛也没太留心讲些什么。

这次比赛，百米，我获第四名，二百米，我获第一名。奖品是张学良将军赠发的银盾和一个奖牌，以外还有一些日用品。

运动会进行中，张学良的一架飞机，在学校上空低空盘旋，这是我生平第二次看见飞机。学校门前有学生站岗，都佩着驳壳枪。

因为这个大学是军人办的，所以学生要受军事教育。

运动会结束时，炮兵总司令邹作华特意宴请了吉林省运动员，因邹是吉林省人，此举可能是表示故乡亲情，也有拢络人心之意。

最后，张学良将军宴请了大会全体人员。地点在张将军公馆的网球场；接送都用载重卡车。因参加的人较多，所以在网球场的四周放餐桌，吃的是西餐。张将军偕同夫人于凤至出席了宴会，并登上场地的一个台子同大家见面。会上发给每个人一件纪念品，是个三寸宽四寸长的黑色钱夹，外皮上印着三个金字——“张学良”，里面装有一张张将军的照片，照片上张学良将军的服饰同现在的电视剧《少帅传奇》中的服饰差不多，只是没戴帽子，照片是黑白的。宴会上还拍了不少电影镜头。

在华北运动会上

一九三〇年春天，华北运动会在沈阳举行（过去是在华北开，这次例外）沈阳在北陵新修了一个体育场。华北几个省都参加了，主力军是北京和天津。

我是吉林省代表队队员，是省内事先按标准选拔的。运动员自带行李，由吉林一师体育教师李香谷带队，住在沈阳东北大学文学院教学楼。（在地板上睡）

这次运动会分中学和大学两个部比赛，有女运动员。比赛项目除田径外，还有篮、足、排、网球。

大会进行中，张学良将军突然出现在网球场，来时没有声张，张将军还下场打了网球，离场时，由卫队摆阵式护拥而归。

当时已经有名的短跑运动员刘长春参加了这次运动会；运动会上，哈尔滨的女选手孙桂云，短跑成绩卓著，也出了名。

朝阳区最早的园林杏花村

李 香 泮

一九四〇年(伪满康德七年)我在长春市一个远房叔父家同雇佣老人屠希贤的一次闲聊中，了解到当时伪满新皇宫建筑营造地(即现在的地质宫北边)曾有一处很有名的园林杏花村。

有一天，我随屠希贤老人上街到了西万寿大街(今西民主大街)在北端转弯的地方(今省军区东南处)我好奇地问老人，杏花村的遗址到底在什么地方？老人用手指着东南约五十米开外的地方，说那就是。只见在铁丝网围墙内，竖着一根三至四米高的三角形木桩，黄漆底，黑漆字，写着“大满洲帝国皇帝陛下登基大典之场所。”老人解释说，大约在五十年以前，那时是清朝，长春还是个寂寞的小镇，有一个叫刘殿臣的农户，住在这里，他在方园四、五垧的地里种植了樱桃、李子和杏树，而其中以杏树为最多，所以人们就把这个村子叫杏花村。这里除了栽种果树外，还利用黄瓜沟的流水，造了一座小池，种植了荷花，风景幽美，使之成了一时名胜。但是“好景不常在”，它先后遭到了沙皇俄国、日本帝国侵略者的践踏，又遭到国民党军队的破坏，因而被弄得面目皆非了。

一九三一年，这里被伪满新皇宫的修建面占用，在一九三七年前后，对多年无人管理的残存的杏树进行了大搬迁，全迁植到白山公园去了(今白山小学校附近)

这就是我当时所知道的杏花村的情况。

回忆常恩多将军

张 树 德

一、廉洁奉公一尘不染

一九三〇年五月，我在东北讲武堂第九期毕业、被派到东北军五旅七十一团任少尉排长，团长就是常恩多。

三〇年十月，张学良将军率东北军陆空精锐部队三十万进关，我在团部当文牍副官兼管庶务，我团经两次改编最后改为五十七军百十一师，常恩多由团长晋升为百十一师中将师长，直辖四个团两个旅，官兵约一万二千五百人，我被调到师部任上尉副官管理师部庶务。我追随常将军十三载，他生活简朴，终年剃着光头，身着布衣，脚穿布鞋，不修边幅，素菜淡饭，常以大豆腐为主要副食，饮白开水，从不喝茶。他严以律己，廉洁奉公。在旧军队中剩余的公杂费是各级军官办公费的结余，余者归己是理所当然的，而他从不乱用剩余的公杂费，当时团长的办公费，每月一百五十元，常将军在当团长时，每月只用办公费的一半，结余部分存起来，到年终春节期间拿出来犒赏部下官兵。常将军当师长后，每月办公费增至三百元，结余部分照样存起来，到年终由军需处以他名义慰劳伤病残官兵。在当时的部队中，当官儿的吃空饷成风，而常将军从未吃一名空额。团军需处每月向上级报表，三个月的空额款就有千余元左右（每人每月按4.08元计算）他命令军需处如数上交。他的高尚品德还表现在不嫖，不赌、不抽大烟，不娶小老婆，尽管妻子是一个

比自己大五岁的农家妇女，可他从不纵欲败度，从不沉溺浊流，这种鄙视糜烂生活的高风亮节在当时东北军的师团长中是屈指可数的，难能可贵的。他始终保持一个堂堂正正的军人本色，表现出“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英雄气概。一九三九年，中共山东分局批准吸收他为中共特别党员。

二、赴战场扼守长江岸

杀敌寇鏖战扬州城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七月二十五日军部命令各师准备奔赴抗日前线，全军家属统一向后方的四川省奉节、万县转移，并调我师一个营担任后方留守护卫；二十六日在誓师大会上，常师长痛斥了日寇的侵略罪行，官兵义愤填膺，高呼口号，吼声震天动地，气壮山河。二十七日常师长率师出发之际，其次子常克从鸡公山东北中学匆匆赶来，为父送行，并立志去参加红军，常将军欣然同意儿子奔向延安。常师长率师离开河南省周口镇，由铁路、公路和运河向长江北岸进军，到达江苏的靖江、南通、如皋、海门、启东等县，沿二百华里长的长江北岸要塞布防，枕戈待旦，常将军兼任长江下游北岸戒严司令，司令部设在南通。为严明军纪，常师长约法三章，要求各级军官身体力行，违令者按章处罚。由于秋毫无犯，鸡犬不惊，使江北出现了战前暂时的稳定局面，工厂照常开工，商店照常营业，学校照常上课，此举深得民心，南通地方专员、县长、西安东北大学救友会等代表各界纷纷前来慰问。因为我师官兵都佩戴《扬开多》三角臂章（扬字代表扬子江，开字代表军长的号：开源，多字代表常恩多。）所以人们都夸赞《扬开多》是一支军纪严明爱国爱民的部队，都想拜访一下治军有方的部队主帅——常

恩多。十月间，日军向华北、华东大举增兵，上海外围要塞相继被日军攻克，市区危在旦夕，同时日军又溯江而上进逼南京，妄图速战速决，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我师奉命转战扬州，截击日军保卫扬州。常师长在扬州南二十里处的江岸咽喉—施家桥，设下伏兵。十月九日凌晨，数艘敌舰载着大批日军在施家桥登陆，当即遭到我军伏击，但因我军只有六六六团两个营的兵力，而敌人增兵数倍，以猛烈炮火轰击我军阵地，同时以坦克开路，致使敌军强占了施家桥。在激烈的战斗中，我军两营兵伤亡惨重。日军占领施家桥后，继续沿施扬公路北上，直逼扬州。为阻击敌人，我师布署六六二团三个营兵力在正面迎敌，并在师部指挥所附近布署了两门平射炮。上午十时，敌人数十辆坦克迎面驶来，距离我军阵地三百米、二百米，越来越近，常师长挥起右手，一声令下“开炮！”敌人的坦克慌忙驶下公路，大批日军从南而向我阵地涌来，我军以准确的炮火把敌人纷纷击毙在阵地前沿。战斗越来越激烈，最后展开了白刃战，日军一批批倒下去，我军大部分也光荣殉国，师长命令师部所有直属营、连全部都投入战斗，始终未让敌人前进一步，坚守了阵地。下午四时，奉军长缪澂流命令，常师长率正面战场上的部队及西侧战场的旅、团撤至扬州仙女庙大桥以北，一面阻击敌人，一面收容散兵，救护伤员，掩埋尸体，最后炸毁仙女庙大桥，率部离开扬州。在这场战斗中，扬州右翼的韩德勤部八个团，见敌军来势汹汹，一仗未打，先溜之大吉了，致使扬州陷入敌人魔爪。

三、将士喋血台儿庄

雄师声震苏鲁皖

一九三八年三月，在徐州东北的台儿庄，四十万中国军队对

七、八万日军展开一场空前规模的大会战。会战开始时，守备在山东临沂的四十一军庞炳勋部告急，常师长奉命派王肇治旅长（现黑龙江省省民革主任委员）率三三三旅参加台儿庄大会战。在争夺台儿庄东面的东西马甸战斗中，该旅六六六团突进三十华里，在处于敌人三面包剿的险恶形势下，他们冲杀了十五、六个昼夜，并攻克了三个日军重要据点。当敌人增援部队以强大攻势从三面逼近时，各营勇士们高唱《大刀进行曲》，在震天动地的喊杀声中，象猛虎一般跃出战壕，扑向敌人，展开了殊死的肉搏战，只杀得天昏地暗，一片腥风血雨，战壕里、弹坑里，处处挤满了血肉模糊的尸体和残肢断臂，杀到最后，残敌仓皇奔命。打扫战场时，敌人扔下近两千具尸体，我军伤亡也很惨重，仅六六六团二营，只幸存营副杜荣民及几名勤杂人员，营长于竹幽及其他战士都牺牲了。

在台儿庄激战的同时，号称精锐的日军邱山旅团三千多人，附工骑兵一部，山野炮八门，在飞机汽艇的配合下，也由长江口直扑苏北的盐城、阜宁，妄图经滨海、灌云、连云港奔向陇海路，威逼徐州，增援台儿庄，当时驻苏北的军队有中央李守维一个军，百十二师，百十一师师部和三三一旅。其中百十二师在上海战役中伤亡惨重正在休整，李守维部从未参加正面作战，而是处处避敌。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为自身安全终日躲在百十一师师部里。常师长得到有关敌人情况的报告后，亲率三三一旅及直属营连增援奉军三五一旅，两军在阜宁会师后，令三五一旅在阜宁南五十里的沟墩堵截日军，并决定支援该旅三门山炮。常师长率本部官兵南进至草堰附近，埋伏在盐阜公路两侧。午夜过后，向北急进的日军邱部大队人马路过草堰，常师长一声令下，霎时间枪炮声、喊杀声、手榴弹的爆炸声交织在一起，日军遭到突然袭击，首尾不能相顾，便向北仓皇溃逃。